ChinaXiv合作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第 62 卷 第 7 期 2018 年 4 月

信息传递视角下智库影响力评估框架*

■ 王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003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

摘要:[**目的/意义**]信息是影响力传导的载体,相比影响力的模糊和隐蔽,信息的传导更为清晰,为此根据智库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的框架提出适用于我国的智库评价框架。[**方法/过程**]分析智库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智库与政府信息传递的基本框架,基于对某中央部级机关部分干部的结构化访谈丰富和完善框架中信息传递的细节。[**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体制约束对通信链路能力、匹配信息需求能力影响较大,智库公共传播能力对调节信息过滤能力影响较大,数据搜集能力、科学客观的数据分析能力、专家的洞察力构成了智库收集和生产信息的能力。

关键词:智库评价 政府决策咨询 智库影响力 信息传递

分类号:C93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07.001

chinaXiv:202308.00355v1

智库评价研究者认为,智库影响力的评价目的有二:一是给智库市场上的需求者提供一个投资和购买智库服务的指南,二是用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指导智库建设[1]。然而现有的智库评价体系多数来自西方,其评价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智库运作的机制,指标体系也仍然深深的受到西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我国新型智库运转和政府决策的环境明显有别于西方,直接照搬西方评价体系的基准,并不能正确的反应智库作用于政府的影响力。影响力的传导是模糊、复杂、隐蔽的,相比之下信息的传递则清晰可见,而信息是影响力传导的载体。笔者因工作之便借此机会深入了解和分析了在特定行业中专家与国家机关的信息交流过程,本文以对该中央部委 6 个具有代表性的业务局中经常负责筹备、举办专家咨询活动的 25 位处级干部的结构化访谈为基础,试图从我国智库参与决策机制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视角构建适用于我国智库影响力的指标框架,为我国的智库建设者们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信息。访谈对象主要来自调研处和政策指导处等部门,一些研究将他们视为政府内的决策咨询部门[2],这些部门是政府与学术界交流的重要枢纽,是政府部门内最关心学术研究的群体,也是最了解政府决策咨询需求的群体。访谈中请他们根据设定好的问题选择答案,并阐明选择该选项的原因,访谈主要围绕选择咨询专家的偏好和倾向、对当前咨询效果和咨询专家的评价、干部自身获取专业信息的渠道 3 个方面展开。

1 文献综述

1.1 智库定义的多样化

智库评价首先要面临两个问题:谁是智库?什么是智库的影响力?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智库”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也是各种利益团体向决策层和公众传达意见的途径[3]。日本学者铃木提出“智库就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4],这是大量对智库定义中限制最少的定义,仅仅约束了相关性,只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即可。而其他一些定义或者约束了目标,例如“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标”;或者约束了其经费来源和体制,如要求“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或者约束了政治立场,如“中立的”。由于这些标准的差异,一些研究机构被认为是“智库”,另外一些则不被认为是“智库”。事实上,这些限制不仅不适用于中国,即使是在西方社会这些形形色色的定义也跟不上智库的多态化发展[5]。在实践中,对智

* 本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新型公安智库的发展策略与情报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6JKF01214)和中央网信办项目“网络反恐重点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欣(ORCID:0000-0002-9340-3815),副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E-mail:wangxin@ppsuc.edu.cn。

收稿日期:2017-11-20 修回日期:2018-01-21 本文起止页码:5-11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ChinaXiv合作期刊

库性质作出过多的限制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国政府部门决策咨询时并不会在意对方是不是一个“智库”,本研究也简单地将所有能够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机构纳入研究范围。

1.2 晦涩不清的智库影响力

安德鲁·里奇认为,智库影响力是智库专家们成功地向一系列政策制定者传递其想法,或者引起他们对政策相关信息的思考与操作[6]。朱旭峰认为智库影响力是智库通过可观测到的行为,直接的或间接的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而做出智库希望得到的政策决策的目标[7]。王丽莉则认为智库的影响力本质上就是智库的舆论影响力[8]。智库影响力是智库作用于决策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这种力量难以被测度的特性,很多影响力指标都是测量与智库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其他能力去替代实际的智库影响力的测量。正如朱旭峰所言:目前我们所测量的影响力往往是“有助于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9]。智库的研究能力、研究基础、智库的舆论传播能力、智库的社会网络资本等都是与对智库影响力相关的能力测度,而并非影响力本身。

1.3 智库评价理论基础的西方化

智库影响力评价是基于解读和分析政策过程的理论基础的。基于西方政治学基础,智库评价往往围绕着智库发挥影响力的三大主要途径进行评判:即对公共舆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力[10]。基于西方政治理论基础的智库评价方案并不适用于我国,然而我国当前较知名的智库评价体系仍然遵循着政府、学术、公众的三元影响力框架,例如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标准将智库影响力划分为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11]。由于我国智库运行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运作与管理与西方智库都存在很大差异[12],基于西方政治理论基础的评价体系从理论基础上就不符合我国国情。除了影响力理论基础造成的评价偏差外,很多智库评价体系的各项影响力指标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使得学术影响力在各种评价体系中的权值被认为放大。尽管学术影响力是智库影响力的重要相关因素,但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目的、导向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种过度倚重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会导致很多地方智库、行业智库的影响力无法得到正确的评价。由于信息是影响力传达的载体,因此基于信息传递的视角分析智库影响力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信息传递指用一定的手段把特定的信息送到特定的信息需求者手里,表现为一种由此及彼的过程[13],信息传递存在于所有的系统中,既是通信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也是信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试图从我国智库参与决策的过程分析出发,基于客观的信息传递视角提出一种新的智库评价框架。

2 智库与政府的信息传递模型

2.1 智库——辅助决策信息的提供者

在我国有这样的先决设定,即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势必要将社会的总体利益作为决策的首要考虑。夏义堃认为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种种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给决策者造成了决策障碍,使决策结果不符合这一目标[14]。本文假设政府决策是在不完美的信息环境中、在不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冲突的条件下,尽力找到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使社会公共利益最优的决策行为过程。此时,政府主动向智库发起决策咨询,是一种向外部信息求助的行为。当政府系统求助于外部信息时,必然存在内部信息是有缺陷的、需要补充的情况,而政府出于自身位置和能力以及限制等原因,无法获得这种信息。智库向决策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的能力,就是一个决策咨询者的影响力。这些信息可以是知识、数据、对复杂情况分析和洞察、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信息可以佐证决策者的预判也可以否定决策者的预判,关键在于信息是真实的、可靠的、科学的、客观的、对决策有帮助的。而智库作为政策过程的参与者,其最终目标与政府是一致的[12],但由于视角和信息途径不同,智库掌握着政府决策缺失的有用信息,他们在决策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向政府传达有助于作出最优决策的信息,其影响力体现在这些向政府传达的信息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及其与政府信息需求的耦合度。因此,智库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提供者,我们将对智库影响力的评估建立在对影响力的载体——信息传递的分析基础之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朱旭峰提出,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认识中国智库组织结构中与决策咨询体系中其他组织发生联系的连接点的作用,对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价值[15],而本文正是基于智库与政府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探索智库影响力的构成。

2.2 智库与政府的信息传递模型

苗绿将我国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总结为参与党和政府重要纲领文件的讨论和起草,通过内参向决策者输送观点、举办学术会议和论坛影响决策、通过讲课培训影响决策、通过出版发行和自媒体平台影响精英及

chinaXiv:201805.00035v1

大众,通过影响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影响决策,并且社会智库在参与决策时实际上是处于被挑选的位置的[16]。本文认为以上这些信息传输渠道确实都可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决策,但是其影响决策的机制是不同的。智库的信息进入政府的通道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渠道和体制外渠道。体制内渠道主要指政府主导的渠道,这类渠道的开闭权在政府,主要包括决策咨询会议、研讨会、培训、政府委托项目以及内参报告,是一种直接表达渠道。另一类渠道就是体制外渠道,主要是通过公共传媒、舆论、学术出版等途径到达政府决策者,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渠道[17]。正如信息的传播与信源的发射功率、信道的容量以及信宿的接受有关,智库向政府决策层传播信息的能力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限制:

(1)信道建立——智库是否能够建立与政府进行体制内沟通的信息渠道;

(2)信息生产——智库是否具备收集和生产政府所需信息的能力;

(3)建立耦合——智库是否具备跟踪政府信息需求的能力;

(4)大功率传播——智库是否具备较强的公众传媒、学术辐射、传播能力。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政府部门中的调研处和政策指导处干部,尽管在一些研究中这类政府内的机构被视为政府内部智库,但是本次调研发现,政府内部的调研处和政策指导处很少直接开展研究,他们往往是决策咨询的组织者和决策咨询信息的收集者、传递者。这些干部在智库与政府通信的框架结构中扮演了信息过滤器的角色,他们直接接收并选择性地转达或帮助智库建立通向最高决策者的信息通道,他们的信息选择倾向受到了他们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和学术以及公共传播中的信息的影响。此外,智库从政府内部获取反馈信息的能力限制了他们提供信息的能力。智库通过信息传递影响政府决策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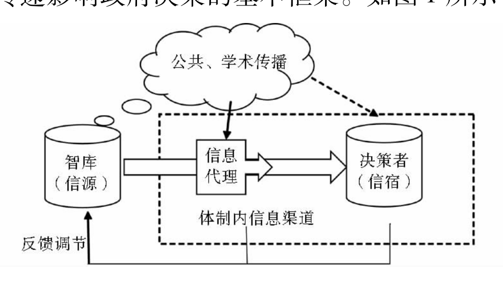


图 1　从智库到政府的信息传递

2.3　基于信息论观点的"决策影响力"

综述部分已经介绍了几个"决策影响力"的概念。无论是引发决策者思考还是直接给出建议和观点,这些概念强调的是智库改变政府决策的能力。从信息论的观点看,使政府改变决策的本质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新的信息,这种信息使得政府重新评估了各项政策的风险收益,作出了更加合理的决策。信息论是基于数学方法对广义的信息传递进行研究的理论。在信息论中,信息是使不确定性减少的物理量。信宿接收到的信息量是它接收到信源发送的信息后,对需判断的未知情况不确定性减少的量,称为互信息量。互信息量既与接收到的信息有关,也与信宿自身的信息需求有关,只有发送端发送的信息很好地耦合了接收端的信息需求,传输的信息量才达到最大。因此,本文认为智库影响力本质上是智库生产并向决策层传输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满足了政府决策的信息需求,减少了政府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基于信息论的影响力定义,比其他定义更加接近影响力的本质。传统智库影响力的定义强调了智库通过种种手段改变政府决策层的想法,事实上智库并非强力机构,它并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使政府听命于它,政府采信了它的建议仅仅是因为他提供的建议提供了政府不掌握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政府重新评估了形势、改变了决策。传统智库的定义强调"改变"决策,事实上这是对"影响力"的一种曲解,使政府"坚定"了原有决策同样也是一种影响力,正如信息接收端接收到发送端的信号后,以更高的确信度维持"原有判断"和"改变原有判断"都是减少不确定性的表现,这两种情况同样都是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因此,"改变"政府决策只是智库影响力的一面,提供的信息使政府"坚定"了原有判断同样也是向政府施加了"影响力"。因此,基于信息论观点的影响力定义更加中立,不附加任何价值判断。

3　基于信息传递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3.1　智库建立通信链路的能力

智库建立与政府长期合作关系的能力,决定了它今后是否能够获得政府信任并与政府交流信息。信息传递包括向政府输出信息,也包括从政府获得信息,这是实现影响力的重要前提。苗绿认为我国智库在参与决策时是处于被动挑选的位置的[16],该观点在本次访谈得到了部分印证,决策咨询活动的参与者是由政府机构挑选的,并且有明显的体制倾向性。访谈数据表明,决策咨询的首选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内的专家(排序得分 3.77 分)、受到该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管辖的

chinaXiv:202308.00355v1

ChinaXiv合作期刊

研究机构的专家(2.77 分)、一般社科院、高校等机构专家(2.23 分)、媒体智库专家(1.31 分)、民间智库专家(0.38 分),排序明显按照体制的亲疏关系由内向外排列。访谈结果的计分方法采用选项平均综合得分 = (Σ 频数 × 权值)/本题填写人次,排序最先的选项权值取值为备选项目的数目,依次降低,本题为选择排序题,未规定必选数量,因此民间智库专家得分低于 1。除政府内部专家以外,政府最信任的是与本部门有一定从属关系的机构,也就是说部委倾向于选择部属研究单位和高校,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地方社科院和地方高校。这些机构具备被信任的先天条件,尤其在一些涉密决策以及涉及重大利益的决策中与政府从属同一单位的智库是政府首先考虑的咨询对象。其他知名科研机构和知名高校也是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选择对象,但是通常由于不够聚焦专业问题或者缺乏对地方或行业具体问题的了解,被置于备选的第二梯队。访谈显示民间智库很少成为政府决策咨询主动选择的对象。笔者曾经对一些民间智库做过访谈交流(如重庆智库),所获取的资料表明已经有一些民间智库主动与政府建立了联系,通过向政府递交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的方式,获得政府部门的肯定和关注,还有有一些政府尝试着与民间智库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18],但是这种信息交流受到"信任"和"保密"事项的困扰,使得这种交流多数是智库到政府的单向信息传递,限制了智库对政府内部信息的获取,也给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范围和能力带来很大的限制。

chinaXiv:202303.00335v1

3.2 信息代理人的过滤机制

朱旭峰曾经对天津市处级干部做过实证调研,分析他们决策咨询的条件、需求以及决策咨询行为与这些官员自身素质的关联[19]。接受笔者本次访谈的处级干部是不具有政策决策权的,但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他们是各类信息的筛选者,是政府决策活动的组织者、是决策者与专家交流的关键中介。高层决策者的时间稀缺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浏览和寻找信息中,他所阅读的信息一定是最精炼、最迫切需求的,而这些信息则必须通过中层干部筛选和向上转达。因此,信息代理人在智库与政府信息传递框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根据笔者的观察与访谈,中层干部对信息通道的控制和信息的过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开展特定题目的专题研讨时,挑选、推荐特定单位与专家;②编辑内参时,评审各类信息通道来的研究报告与意见;③维护管理专家库;④参与研究项目的设立与评审,具有投票权;⑤编写各类报告,向更高级别汇总、反馈专家意见。访谈结果显示,干部在专家研讨会和编辑内参时的主导权更大,分列第一和第二。同时,被访者认为"内参报告"(3.46 分)和"专家咨询"(2.46 分)对高层的决策影响力最大。因此,除去部分极少数建立直通决策层的信息传递通道的智库,多数智库进入决策层的信息是受到中层干部的过滤和控制的。

根据朱旭峰对处级干部决策咨询行为的研究结果[19],我们可以假定信息代理人的信息过滤偏好是受其教育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公共传媒和学术传媒的共同影响的,代理人的人口统计情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调节信息过滤的主要因素是公共传媒和学术传媒。在参与调研的干部中,35 - 45 岁的中青年占比 66.7%,85% 以上拥有博硕士学位,50% 以上从业超过 10 年。这说明被访干部普遍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丰富的业务经验,是具备筛选和判断信息质量的能力的。研究也对他们平时获取和更新专业知识的途径进行了调研,多达 88%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阅读网络专业文章",58.3% 的选择了"阅读专业著作",50% 的人选择了"参加培训",33% 的人选择了阅读"专业杂志",只有 25% 的人选择了"阅读学术期刊"。这说明传统的对智库评价中,依据专业期刊文章发表数据评价影响力是没有根据的,即使是受过硕士、博士专业训练的年轻中层干部也很少人会阅读专业期刊文献。根据访谈,学术期刊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是获取不便,以及重在理论辨析与实践关联较少;而网络文献获取便利,很多专业公众微信号办得很好,专业性与通俗兼备,阅读这些文献不需要专门安排时间,对于时间紧张的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更新专业信息的方法;专业著作较为系统,适合较为完整的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理论;单位根据业务需求经常安排的培训也是系统的更新知识的重要渠道。

综上,智库的公共传播能力并非是直接的决策影响力,但公共传播能力调节着政府与智库信息传输框架中信息代理人的信息过滤偏好,间接影响了智库与政府的信息流通。智库公共传播能力中重要的指标与传统衡量学术成就的指标相差很大,智库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能力、深入政府机构开展培训的能力、产出高影响力著作的能力是智库公共传播能力的关键指标。

3.3 匹配信息需求的能力

国内很多评价体系将"获得领导批示"视作一种

chinaXiv:202303.00035v1

智库影响力的实现,"获得领导批示"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提供者与信息需求者的匹配成功,只有需求匹配了,影响力才得到体现。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政府的需求却与专家提供的信息难以匹配。缺乏对实际工作的了解,不掌握实际的数据信息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无法匹配政府决策信息需求的主要原因。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研究出发点也导致了这种信息的供需矛盾,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学术观点出发,而未能从政府决策角度出发。对于访谈问题"您认为哪种机构专家意见对领导决策提供的信息更多,影响更大?",排序得分最高的是"政府部门内专家"(4 分),其余依次是行业院校和行业研究机构专家(2.82 分)、一般院校和研究机构专家(2.18 分)、民间智库专家(1 分)。这个排列规律与研究机构获取内部信息的机会相一致。被访者们认为政府部门外专家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次是"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3.77 分),其次是"信息不是政府所关心的"(2.31 分)、"观点没有从决策角度出发(1.69 分)"等。这说明获取政府内部信息的能力限制了智库的影响力。

智库想要实现影响力,必须主动获取并匹配政府的信息需求。这要求智库具有能够从政府内部获取信息和数据的能力,具有政府决策视角的观察力与思考力。在西方智库中,强调"旋转门"机制,从信息传递的观点看,这其实是一种通过旋转机制获取政府内部情况的做法,通过人才流动打通信息的流通。在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旋转门——挂职制度,近些年在政策的支持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人员到政府单位挂职锻炼的交流越来越多。显然,具有这种人才交流优势的智库拥有更多机会近距离观察和获取政府的决策信息需求以及实际情况。然而目前多数的"挂职"锻炼限制在行业或地方政府内部,例如属地院校到属地政府挂职,行业院校到行业部门挂职锻炼,这种机制再次限制了政府与本地区、本部门以外的智库之间的信息交流。

3.4 收集数据和生产信息的能力

智库实现影响力的主要方式是向决策层传递有助于决策的信息。访谈显示,政府主要缺乏两项信息:第一,政府不便搜集或无职责搜集的信息;第二,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相比学术界,政府有着无可比拟的信息搜集优势,但是其搜集的信息多数是业务数据,数据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立体度不足,数据模型是根据管理需求设计的,而非根据问题研究分析的需求设计,无法满足决策需求。更重要的是政府分析和处理信息能力不足,无法有效的处理信息,洞察问题、提炼真知。访谈中对于问题"您希望专家带来哪些帮助?"的答案中得分最高的是"辅助决策的科学分析方法"(5 分),其次是"详实客观的调查数据(3.22 分)""理性、深刻的分析观点(2.01 分)"等。这表明政府决策时最希望从智库那里得到的能力是稳定可靠的数据搜集能力、科学客观的数据分析能力、深刻的洞察力,这三种能力构成了智库收集和生产信息的能力。

本次调研中,被访者对科学分析方法的渴求超过了数据和专家。中央政府职员平均学历高、受过较好的学术训练,加之工作经验丰富,并不十分"迷信"专家能够凭空提出更加高明的分析;而科学训练的经历和工作需求使得他们更相信工具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很多智库都十分注重科学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过程中的应用,例如兰德公司就十分热衷于探索和使用科学的分析平台以及分析方法,德尔菲法、数学建模及仿真方法、网络理论、运筹理论、博弈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在政策分析领域的应用都与兰德公司相关,甚至一些分析方法就是兰德公司首创。相比之下我国智库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在科学分析方法的应用水平和应用范围都远远低于美国智库[2]。

"数据"在被访者的对智库的期待中排列第二。过去,智库的数据多数来源于社会调查,兰德、皮尤等智库都具备非常卓越的社会调查能力。我国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研究机构也拥有一批具有特色的调查项目和调查中心,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系列蓝皮书、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等。这些独立的机构,以长期、稳定、科学的数据产出以及基于数据的科学分析和观点论证,弥补了政府决策的信息不足。大数据时代,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拾取和分析人们活动留下的数据获得,未来一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完全可以依靠其拥有的大数据优势,成为重要的新型智库。例如:阿里巴巴基于海量电子商务数据成立了阿里研究院,腾讯基于海量社交数据建立了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百度基于搜索数据成立了百度数据研究院[20]。特有的海量数据资源加上强大的计算分析能力,这类智库在未来将具有非常强大的智库市场竞争力和政策影响力。

3.5 基于信息传递的智库影响力评估框架

基于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信息传递影响因素分

ChinaXiv合作期刊

析,可以建立一个基于信息传递模型的评估框架,将智库影响力评估分解为:①建立通信链路的能力;②调节信息过滤的能力;③匹配信息需求的能力;④收集和生产信息的能力。表 1 粗略的显示了基于此框架的指标结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个框架的各个分指标并非简单相加的关系,智库影响力的实现需要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的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导致智库影响力无法得到最终实现。表 1 显示了本框架的一级指标和相应的二级指标体系,本文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但是二级指标体系中的项目均可以依靠可获得的数据和成熟的量化方法及其已有的衡量评价方法获得。

表 1　基于信息传递视角的智库评价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建立通信链路的能力指标	智库性质
	在政府内建立专有信道的数量
	进入各级政府信息筛选范围
	承担政府研究项目的数量
调节信息过滤能力指标	社交网络传播指标
	网站传播指标
	专业著作传播指标
	给政府部门培训指标
匹配信息需求能力指标	与政府人才交流指标
	参与实地调查研究指标
	参与政府研究项目指标
收集和生产信息能力指标	社会调查能力指标
	大数据获取能力指标
	数据分析能力指标
	高水平人才指标

chinaXiv:202308.00355v1

4　小结

本文从信息传递视角,分析了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与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库影响力评价框架,从建立通信链路、调节信息过滤、匹配信息需求、收集和生产信息能力四个关键步骤分析了智库向政府传递信息、影响决策的必备条件,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智库评价和智库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本文的调查样本主要来源于同一个国家部级机关,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更广泛的范围需要更多数据的验证。同时,本研究仅仅提出了智库评价的框架,并未给出具体的评估算法,后期还需收集更多的案例及数据明确和完善具体算法,并将本评价体系的评估结果与其他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媛媛,李刚,关琳. 中外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述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37(4): 35 - 45.
[2] 傅广宛,张凌. 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重复建设与治理对策[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6 (2): 51 - 57.
[3] 任晓.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与运作机制[J]. 现代国际关系,2000(7): 18 - 22, 48.
[4] 帕瑞克·克勒纳,韩万渠. 智库概念界定和评价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5): 25 - 28, 33.
[5] 戴安娜·斯通,唐磊. 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4(3): 4 - 16.
[6] RICH A.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2.
[7] 朱旭峰. 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22 - 23.
[8] 王丽莉. 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
[9] 朱旭峰. 智库影响力测量的多维性[N/OL]. 学习时报, 2017 - 04 - 10(006).
[10] 朱旭峰,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12): 4 - 5, 21 - 26.
[11]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李凌. 中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J]. 社会科学, 2014(4): 4 - 21.
[12] 傅广宛. 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中国特色"内涵研究——以中西方比较为研究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0(12): 57 - 60.
[13] 李超平,戴言. 政务信息传递及其控制[J]. 情报资料工作, 2001(1): 21 - 23.
[14] 夏义堃. 非对称信息环境下政府决策行为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840 - 844.
[15] 朱旭峰. 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5): 29 - 33.
[16] 苗绿. 中国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机制分析——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推动国际人才相关政策为例[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5): 75 - 81.
[17] 朱旭峰. 中国社会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1 (2): 1 - 27, 243.
[18] 唐磊. 中国民间智库 30 年的初步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 (4): 99 - 112, 129.
[19] 朱旭峰,王倩茹. 政府决策者能力与专家咨询选择:基于天津市政府官员的实证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0 (4): 47 - 67, 203.
[20] 丁炫凯,徐致远. 我国互联网企业智库成果量化分析——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16(5): 17 - 24.

ChinaXiv合作期刊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Think Tanks Influence from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Perspective

Wang Xin

College of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 terrorism,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Rearch Center,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is the carrier of influence transmission, compared with the fuzziness and concealment of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s more clear and visibl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influenc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think tanks influence. [**Method/process**] After analyzing the key steps of influenc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s, this paper developed a framework of influence transmission. Then, thou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some cadres that from related departments of Chinese ministry, it enriched the framework'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details. [**Result/conclusion**] System constraints have great effects on the capacities of communication link and information demand matching.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think tank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adjustment capacity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Data collection capacity,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data analysis capacity and expert insight constitute the capacities of think tanks to collect and produce information.

Keywords: evaluation of think tank　government decision consulting　think tank influen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hinaXiv:202308.00355v1

《图书情报工作》2018 年选题指南

说明:本刊欢迎任何有理论、方法、技术、实践等方面创新的研究性学术成果,欢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支持的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本刊近年的选题指南仍具参考价值与指导作用。

1. 文化强国建设中图书馆的使命与担当
2. 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学知识体系重构
3. 图书情报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研究
4. 图书情报事业平衡充分发展战略研究
5. 图书馆支撑“双一流”建设的能力与策略
6.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元数据体系构建
7. 信息用户行为与用户画像研究
8. 智库研究与智库服务
9. 资源发现与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模式
10. 数字文献与数据管理及长期保存
11. 图书馆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
12. 数字人文、数字遗产及其相关技术
13. 语义技术、关联数据与知识组织
14.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15. 万物智能的发展趋势与图书馆服务创新
16.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
17. 开放数据与信息安全政策
18.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理论与实践
19. 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图书馆出版)
20. 新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7 年 12 月